

中央研究院  
三民主義研究所

#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

中華民國，臺北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

中央研究院

三民主義研究所

#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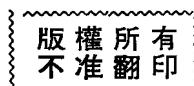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編輯委員會主編

中華民國，臺北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

---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編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中國海洋發展史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  
印刷者 永 裕 印 刷 廠  
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出版

---

## 引　　言

三民所從民國七十二年決定推動研究中國海洋發展史的計畫，主要基於下面三個理由：

第一，中國不只是一個大陸國家，也是一個海洋國家。但以往國內史學界的研究偏重於前者，對於後者似乎沒有給予足够的注意。

第二，十五世紀西歐國家開始展開史無前例的航海與殖民運動，這個運動改變了世界文明的面貌，也改變了中國文明的面貌。了解中國人傳統的海洋發展，以及在歐洲人的影響之下這種發展所發生的變化，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第三，今日臺灣是一個漢民族殖民建立的社會，是中國人向海洋發展所造成的歷史事實。我們有足够的興趣和切身的需要來了解這種發展。

今年六月二日和三日兩天三民所舉辦了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集合國內的專家學者們宣讀論文和討論問題，這些論文現在集成一冊，算是本所推動中國海洋發展史研究計畫的初步成果。凡事起頭難。如果這個會議和這本論文集能算是一個好的開始，那麼中國海洋發展史的研究也許可以在這個地方逐漸建立起它的地位，顯示出它的意義。我們願意以審慎的樂觀態度，來預期這個計畫的逐步展開。

陳昭南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

## 序　　言

本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爲擴展民族主義研究的領域，這兩年來特別提倡中國海洋發展史的研究，集合國內興趣於海洋發展史的同工，每月聚會研討。本年六月二日至三日，更召開「中國海洋發展史研討會」，共有研究者六十多人與會，發表論文十三篇，可以說是國內較難得一見的專門性學術聚會。筆者早年亦曾從事東南亞華僑社會之研究，範圍與本次會議相近，所以也應邀與會，並擔任論文評論人與年輕一代學者共同討論，頗覺獲益良多。現研討會論文集即將出版，主持人文邀約爲全書寫一序言，我個人對這一領域實在疏放已久，但又感盛情難卻，勉強寫就這一短序。

我國疆域廣大、幅員遼闊，早期歷史之活動都以內陸爲重心；開疆闢土，與異族異文化之接觸，亦莫不以陸路爲主。然自宋代以後，海疆的開拓逐漸重要，以東南沿海地區爲根據地的海外貿易與拓殖也漸受注意，而經由海路的文化接觸更取代前此西向陸路的關係，故海洋發展的歷程已成爲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頁。

對中華民國海洋發展史的研究，如從地理區域的觀點而言，大致可分爲三個部分，其一是作爲海外發展基地的沿海地區，其次是沿海的島嶼——包括臺灣與海南島，再次是非本土的海外地區。這三個區域之間的問題互相構成密切的關係，對於其一問題的瞭解，必能幫助其他問題的解答；假如對某一區域的忽略，很可能導致其他區域研究的缺陷，所以研討會同仁在探討問題時的設計上，即努力兼顧這三個

區域，而本論文集的編排也是依三個區域的次序集成。

在沿海地區這一編中，共收有論文六篇。首先是李東華先生的「宋元時代泉州海外交通的盛況」一文，這是討論海外發展根據地的問題，這無疑是有關沿海區域研究項下首要的問題，沿海港埠的發展，實是海外拓殖最關鍵之所在，而泉州在所有港埠之中，確也居於最重要的地位，所以這篇論文的列於首篇，有其作為導引的意義。在有關港埠發展的研究方面，章英華先生的「清代以後上海市的發展與民國初年上海區位結構」一文，也應屬之，只是在年代上已相去好幾個世紀了。在泉州與上海各自扮演作為海外發展的據點之間，數世紀之中各有若干港埠分別居重要的地位，例如廣州、汕頭、廈門等，假如能在時間與空間的聯結上，把海外發展的這許多港埠串聯起來，對整個發展的歷程，必有重要的意義，這應是今後研討會努力的重點之一。

其次是曹永和先生的「試論明太祖的海洋交通政策」一文。各時代的海洋交通政策及其執行情形，無疑是海外發展的另一關鍵問題，特別是各朝的海禁更影響海外拓殖的連續關係，對這些問題的探討，也應是可以再開展的領域。張彬村先生的「十六世紀舟山羣島的走私貿易」與陳慈玉女士的「以中英印三角貿易為基軸探討十九世紀中國對外貿易」兩文構成對另一問題探討嘗試。正式貿易與走私貿易在官方的立場上而言是兩種不能並提而論的活動，但對民間或研究者而言卻是兩種互補關係的歷程，從這一項行動的兩面去觀察海洋拓殖與貿易關係，將是值得更進一步試探的項目。

在沿海地區這一編之下的最後一篇論文是梁其姿女士的「十七——十八世紀長江下游之育嬰堂」一文，這篇論文從嚴格的角度來看，實在不屬於海洋發展史的範圍。假如本文敍述該兩世紀中國育嬰堂為何受到法國育嬰堂觀念的影響，也許可以勉強涉及接觸異文化後

所引起的反應，這也可說是研究海洋發展領域中的一個附帶應該探討的課題，可惜全文中除提及耶穌會教士對當時育嬰堂的看法外，並未真正涉及外來文化的影響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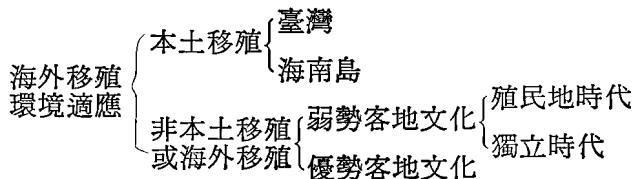
其實在沿海地區的研究上，除去上面討論的諸問題外，該區域的社會史、經濟史及人口變遷史等等，更應該受到重視。此外，因為海外貿易與移植所產生的種種迴響，也是值得注意的，陳達的「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一書雖說是「同時限」性質的社會學研究，但是他分析閩粵僑鄉社會的本質以及華僑對故鄉所產生的影響，卻是一個很好的典範。總之，在海外發展的根據地一方面的研究上，我們仍然有很多課題有待接續去探討。

第二部份關於沿海島嶼移植問題共有四篇論文，全部是關於臺灣拓殖的文章。關於臺灣的開拓可否置於海洋發展這一問題之下來討論，尚有許多爭議之處。筆者以為把臺灣的開拓移植經驗，置於一個大架構下來探討，應有其意義，但是其討論的範圍應該加以界限，也就是限定在移植的過程上，而不應該無窮盡地延伸。換而言之，臺灣的經驗要置於海洋發展的項下去研究時，應該限定於移植時期，而一旦到完全定居下來，就應該成為「海內發展」研究的部份了。也就是在一這論點上，陳其南先生的「土著化與現代化：論清代臺灣漢人社會的發展模式」一文就有很重要的意義，陳其南所說的「土著化」一詞雖受到與會同仁的爭議，但是不管名詞的恰不恰當，其所指脫離移植社會的特性而趨於定居的狀況則甚為明確，以這一分界點作為「海外」與「海內」發展的指標，應該是很合宜的，同時也就是在這一意義上，莊英章先生的「唐山到臺灣：一個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一文，就顯得更有意義了。臺灣移植地區社會史的探索，不但幫助瞭解漢民族移民發展的模式，而且有助於海外地區華僑社會傳統血緣及地

緣團體適應與變異的探究，假如我們再有更深入的沿海地區社會史的資料，則三方面材料的匯合，將使問題的剖析與發現更為清楚。倘若以上述立場來看另一篇論文：黃富三先生的「清季臺灣外商的經營問題：以美利士洋行為例」，則在年代上已超越了定居化的時間，但是若以與外商貿易關係的立場看，似又仍在研究的範圍之內。不過，不論從那一立場看，張炎憲先生的「臺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分裂」一文，就很難於包括在這一範圍之中了。

第三部份海外地區的研究應該是傳統海洋發展史最主要的部份，可惜在這一次研討會中只得三篇論文：麥留芳先生的「早期華人社會組織與星馬城鎮發展的模式」，古鴻廷先生的「星馬華人政治與文化認同的困境——南洋大學的創立與關閉、與吳劍雄先生的「一個海外華人社區的興起與沒落——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中國移民在美國賓州匹茲堡地區的經驗」。這三篇論文的前二篇都是關於「馬華」的問題，第三篇則是新大陸小城鎮的華人移植史的研究，這一對比，初看起來覺得相距太遠，但是細心一想，這三篇所論的卻實際上代表華人文化移植海外的三種客觀環境形態，探討不同環境形態下華人社會文化的發展，正是這一研討會的主旨。華人移植海外對僑居地客觀環境的感受，首先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客地文化較弱者，如東南亞、太平洋及中南美各地；另一類則是客地文化較強者（最少在移植者的主觀看法如此），如美國及西歐各國。在弱勢與優勢文化之中生活，其適應情況自然不同。麥文與吳文可以看出這兩種適應的差異。但是這兩分類如再加上時間的因素，則又可再分，例如弱勢文化一類之下，大半可再分為殖民地時期其獨立時期兩階段，在殖民時代的適應最少可免去政治認同的困境，在獨立時期，政治認同的困境則逐漸加大，古鴻廷的論文即代表後一經驗的探究。

假如從上述客地環境分類的立場去瞭解海外移植適應問題，分類的範圍仍然可再擴大，例如本論文集第二篇所探討的在沿海島嶼移植的經驗，也可看作是一種無客地文化或在本土內移植的適應，如此與上述分類配合，則可分類表如下：



這個分類的種種相關比較問題，假如能在一個大研究計畫下分別作綜合比較的研究，似可以在一個層次上對海外發展的研究提供進一步的思考架構。

總結而言，本論文集代表當代學者企圖在「中國海洋發展」這一大主題下的不同研究成果，從各篇論文中我們可以看出個別作者的高度學術水準以及他們共同的理想，同時也可由此探思出在這一計畫下許多可再加努力的方向。

李亦園

寫於南港中央研究院

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 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

## 目 錄

引 言.....	陳昭南.....	i
序 言.....	李亦園.....	ii
<b>沿海地區</b>		
宋元時代泉州海外交通的盛況.....	李東華.....	1
試論明太祖的海洋交通政策.....	曹永和.....	41
十六世紀舟山羣島的走私貿易.....	張彬村.....	71
十七、十八世紀長江下游之育嬰堂.....	梁其姿.....	97
以中印英三角貿易為基軸探討十九世紀中國的對 外貿易.....	陳慈玉...	131
清代以後上海市區的發展與民國初年上海的區位 結構.....	章英華...	175
<b>臺灣地區</b>		
清季臺灣外商的經營問題——以美利士洋行為例...	黃富三...	249
臺灣文化協會的成立與分裂.....	張炎憲...	271
唐山到臺灣：一個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	莊英章 周靈芝...	297
土著化與內地化：論清代臺灣漢人社會的發展 模式.....	陳其南...	335

## 海外地區

早期華人社會組織與星馬城鎮發展的模式………	麥留芳…	367
星馬華人政治與文化認同的困境：南洋大學的創 立與關閉………	古鴻廷…	405
一個海外華人社區的興起與沒落：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賓州匹茲堡地區 華人的經驗………	吳劍雄…	423

## 編 後 話

# 宋元時代泉州海外交通的盛況

李 東 華

## 一、前 言

在中外海上交通史上福建泉州（晉江）曾有過一段輝煌的時期。自唐末（九世紀下半期）起，泉州成爲我國對外貿易主要港埠之一，其後由於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它成爲我國當時兼通南海與東北亞日、韓地區的唯一港埠，而在宋南渡後至元末的兩個半世紀中，盛極一時，成爲宋元時代最足以反映當時海外交通繁盛的港埠。

泉州所以足以反映宋元時代海外交通的繁盛，可以由以下兩方面來作觀察。從中國對南海的交通貿易來說，由早期（魏晉以前）的交州時代，經過廣州時代（魏晉迄唐末），再發展至宋元的泉州時代，貿易港埠的不斷東移，象徵我國南海貿易的不斷進展。再由中國對東方東北亞（日、韓等地）的交通貿易而言，也經過了登、萊時期（隋以前），揚州時期（隋唐）、明州時期（北宋），而發展至南宋元代的泉州時期，貿易港埠的逐漸南移，也反映了中國對東北亞地區交通貿易的日趨繁盛。泉州匯集了我國向東、向南兩路的交通貿易，確實足以反映宋元時代在對外開放政策下，我國海外交通貿易的極度興盛。這種情形在明代行海禁及貢舶貿易後，即不復再現。因此本文以宋元時代泉州海外交通的盛況爲題，期望透過對泉州貿易港的了解，能對當時我國繁盛的海外交通有深一層的認識。

## 二、宋元時代泉州海外交通興盛的背景

有關宋元時期泉州海外交通興盛的原因，本人曾先後發表「五代北宋時期泉州海外交通轉盛的原因」及「宋室南遷與泉州地位的提昇」兩文<sup>①</sup>，對泉州興盛的背景有所探討，此處僅由以下三個角度對泉州興盛的背景作一簡略的說明。

先從中外海上交通發展的背景來看，泉州的興盛是唐末（八世紀）世界性海上貿易圈形成下的產物。在八世紀以前，我國向東與東北亞地區及向南與東南亞地區的交通貿易，是分途發展的。但到八世紀以後，由於阿拉伯（大食）人的海上活動，使得以西亞阿拉伯帝國與東亞唐帝國為兩軸心的世界性海上貿易圈形成，促使我國向東與向南兩路貿易的銜接，我國對外海上貿易中心乃逐漸由廣州東移泉州<sup>②</sup>。這是泉州興盛的重要背景之一。

其次，由我國南向開拓的觀點來看，安史之亂到宋室南遷是我國經濟重心向南轉移的過渡時期<sup>③</sup>。福建地區是我國南向拓殖的終點地區之一，這段時期也正是福建由開發經成熟以至於飽和的時期，成為支持泉州對外貿易的重要資源，這尤其反映在福建地區發達的工商業上。宋後由於福建農業發展之不足，故工商業的發展在福建非常明顯，諸如銅器、鐵器、陶瓷器、紡織工業等均極為發達，成為泉州對外貿易的重要商品。因此泉州在宋後具備經濟相當發達的腹地，也是

① 前文發表於《食貨月刊復刊 11 卷 11,12 合期》（民 71 年 3 月 1 日），頁 1-17。後文發表於《史原第 11 期》（民 71 年 12 月 31 日），頁 197-212。

② 詳見拙著，「唐末泉州的興起及其背景」（臺大歷史系學報 9 期，民 71 年 12 月），頁 123-151。

③ 參張家駒，兩宋經濟重心之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頁 2。

泉州對外貿易興盛的重要背景。

最後從福建地區本身來看，福建自古以來就具備相當良好的航海環境，對於海舟的製造及海上生活的體驗，都有相當良好的經驗<sup>④</sup>。而自唐末五代以後，由於人口大量增加，耕地愈顯不足，在農業發展已達飽和程度下，泉州人民只有走上工商業及向海上發展的路，這可由下引兩首詩作最好的說明。北宋泉州惠安人謝履「泉南歌」云：

泉州人稠山谷瘠，雖欲就耕無地闢，  
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

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十二，「泉州南廓」亦云：

閩人務本亦知書，若不耕樵必業儒，  
惟有桐城南廓外，朝爲原憲暮陶朱。

前者述說泉州人向海外的發展，後者描繪泉州（桐城）城的商業風氣，說明宋代閩南社會的貿易取向與向海外發展的風氣，也是促成宋元時代泉州交通貿易興盛的重要原因<sup>④</sup>。

總之，從中外海上交通的發展上看，唐末形成了所謂「世界性海上貿易圈」，使得我國東南沿海諸港，成為中西海路交通所必經。由中國南向拓殖的觀點來看，宋代福建地區的農業發展已達飽和狀態，農村大量剩餘的人口乃興向海外發展的意念，故泉州海外交通是我國南向開拓達於南方海濱後，社會經濟發展達於飽和狀態下的必然現象。再加上福建地區自古即有良好的航海傳統，因此閩南社會遠出海外貿易乃蔚成風氣。這些因素都是造成宋元時代泉州海外交通空前繁榮的重要原因。

---

④ 有關福建地區的航海傳統及商業風氣，詳參拙著①前文。

### 三、宋元時期泉州的海上交通 ——從幾個現象看其盛況

宋室南渡後，泉州對外海上交通逐步凌駕廣州之上，成為我國對外交通、貿易的重要港埠。有關此問題，學者論述者已多<sup>⑤</sup>。本文僅就以下幾點，略作探討，以補以前學者所說之不足。

#### 1. 國內沿海交通樞紐地位之形成——近接三吳，遠連二廣<sup>⑥</sup>：

宋室南渡後泉州海上交通繁盛的第一個表徵，就是國內海上交通之興起，使得泉州逐步在此海上交通中居於樞紐地位。南宋由於政治中心杭州在海濱，政府又努力提倡對外交通貿易，故東南沿海一帶海運有空前之發展，海道運輸已不似以前一樣僅限於體積小、重量小、價值大之奢侈品，而包括體積重量較大而價值較小的一般商品，譬如諸市舶司羈色物貨之運行在及日常稻米的運輸均由海道運送。此處先言稻米之運銷，前已說明福建地區自五代以來由於人口大量增加，山多田少，已有糧食不足的現象，而南渡後人口驟形增加，缺糧現象更為嚴重。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十五，奏乞撥平江（府）百萬倉米賑糶福建四州狀有云：「福與泉、興，土產素薄，雖當上熟，僅及半年，專仰南北之商轉販以給。」同書卷十七知泉州謝表亦云：「泉雖閩鎮，古號郊樂，其奈近歲以來，浸非昔日之觀。征榷大苛，而蠻

<sup>⑤</sup> 如桑原薰藏著，馮攸譯，中國阿拉伯海上交通史。藤田豐八著，何健民譯，宋代市舶司與市舶條例（收入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頁239-342）及石文濟，宋代市舶司之設置與職權之研究（史學彙刊創刊號）等均是。

<sup>⑥</sup> 輿地記勝，卷一三〇，福建路泉州條風俗形勝引南宋初連南夫修城記云：「近接三吳，遠連二廣，萬騎貔貅，千艘犀象。」又引陸宇修城記云：「泉距京師五十有四驛，連海外之國三十有六島，城內畫坊八十，生齒無慮五十萬。」頗能形容宋室南渡後泉州之盛況。

深罕至，滂傷相繼，而農畝寡收……粟生於地者幾何，日伺鄰邦之轉餉……盼焉帆檣之來。」至於泉州仰仗轉餉處，趙汝愚趙忠定公奏議卷二，請支撥和糴米十萬石付泉、福、興化三州賑糴奏說的很清楚：「本路（福建）地狹人稠，雖上熟之年，猶仰客舟與販二廣及浙西米前來出糴。」朱文公文集卷二五，與建寧司論賑濟劄子亦云：「廣南最係米多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舶交海中。」李曾伯可齋續藁後卷六奏乞調兵船戍欽仍行海運之策亦云：「又如閩浙之間，蓋亦嘗取米於廣，大抵皆海運，雖風濤時乎間作，然商舶涉者如常。既可以至閩、至浙、至瓊，則亦可以至欽，明矣！」可見即在平時，福泉地區亦須仰仗客舟由浙西及兩廣運米來糴，日常海運已極頻繁，至遇有荒歉時，由兩廣及浙西來糴之舟更多。如朱文公文集卷九八傳（自得〔應爲修〕）公行狀云：

至是泉州大旱，而守利督租，諱之。公奏請募舟二廣糴，以助民食，由是米不翔貴。

前引趙忠定公奏議卷二請支撥和糴米十萬石付泉、福、興化三州賑糴奏亦云：

今歲適值二廣更旱，米價比常年增及一倍以上，州縣閉糴，客舟至彼皆空載而返。緣此雖是秋成之際，大州（福）米價全不甚減，泉州、興化其價尤貴。

更可明顯看出每遇天災，福、興、泉、漳諸州仰賴客舟由兩廣或浙西糴米益切，泉州與浙西、兩廣之海上交通，自必更爲頻繁。其中尤以閩廣間之交通爲最。真文忠公文集卷十五，申樞密院乞修沿海軍政狀云：「又福、泉、興化三郡，全仰廣米以贍軍民，賊船在海，米船不至，軍民便已乏食。糴價翔貴，公私病之。」<sup>⑦</sup>更由於福建居於浙、

⑦ 同書同卷申尚書省乞措置收捕海盜狀亦云：「兼福、泉、興、漳，全靠廣米，以給民食。」亦可得見。

廣間，有時成爲此兩地稻米之轉運站。建炎以來繫來要錄卷三四，建炎四年五月己卯條載：

詔廣東轉運司募使臣押糧舟，自海道至福州交納。

同書同卷同年六月甲午條亦載：

中書門下奏，行在仰食者眾，食廩不豐，請委諸路漕臣及秋成和糴。詔廣東糴十五萬斛，福建十五萬斛，並儲之漳、泉、福州。

由廣東和糴之米，或至福州交納，或儲之漳、泉、福州，已可顯明看出福建沿海諸地的轉運地位。而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卷十五載紹興五年事，說的更爲明白：

（紹興）五年，上在臨安，又命廣東漕臣市米至閩中，復募客舟至行在。

「要錄」卷九十紹興五年六月辛未條載其事更詳：

左丞議郎值寶文閣知婺州周綱，特轉一官。綱，紹興初爲廣東轉運判官，奉詔以本司錢市米十五萬斛，自海道至閩中，復募客舟赴行在。故遷之<sup>⑧</sup>。

除了稻米的運銷外，由福建海商販往外地的大宗貨物，還有布匹及生鐵。嘉泰會稽志卷十七布帛條云：「今越人衣葛出閩賈。」淳熙三山志卷四一土俗類三物產鐵條亦云：「商賈通販於浙間，皆生鐵也。慶曆三年（一〇四三）發運使楊吉乞下福建嚴行禁法，除民間打造農器、鍋斧之外，不許私販下海。兩浙運使奏，當路州軍自來不產鐵，並是泉福等州轉海興販，逐年商稅課利不少，及官中取納折稅，收買打造兵器。乞下福建運司曉示，許令有物力客人興販，仍令召保出給長引，只得詣浙路去處販賣，本州出給公據。」至正四明續志鐵

<sup>⑧</sup> 宋會要食貨四〇，所載略同。